

# 感受中国哲学叙事的浩然之气

贾玉明



贾玉明 沈阳工业大学党委书记

经典需要常读细品,就像挚友需要经常沟通交流一样。现在讲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具体而言,很多思想家的观念主张蕴藏着解决问题的智慧,启发人们如何自正其身。

因为专业的原因,大学时代我就系统学习过《中国哲学史》,记得当时是著名哲学家萧蓬父、李锦全主编的,很权威,也很难读。后来,我又系统阅读了冯友兰、劳思光、张岂之,还有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编著的若干版本,深受启发,倍觉常读常新。

孟子生逢“杀人盈野、杀人盈城”的战国乱世,可谓是以浩然正气挺膺担当的志士,以向诸侯国推行“仁政学说”为己任,力劝统治者施惠于民。他为了突出民

本主张,大胆提出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。”对这种以民为本、体恤苍生的坚守,和对王权统治的大胆批评足以令人动容。面对世间充斥着杀戮、险恶、功利和自私,“四端说”横空出世,开明宗义指出,恻隐之心仁之端也,羞恶之心义之端也,辞让之心礼之端也,是非之心智之端也。坚定认为人性本善,进而指出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”,人和禽兽存在着很小的差别,万不可抛弃这种差别,而应该通过自省去保持和扩充这些善的品质。今天从学理上看并不算是科学论证,但从当时的人性意义上看无异于昏暗宇宙中的太阳光芒,启导人心向善,说服君主推行仁政。这是对当时人性问题的伟大唤醒,真可谓用心良苦!每次读到动情处,无不感佩赞叹,每每遇到挫折和困难时,都会从内心深处唤醒这种大任大勇大德,激荡我内心的良知,以充盈之正气勇敢面对,信步前行。

另一个感染我的是墨家代表人物墨翟,他主张“兼爱非攻”,认为攻掠他国的战争是最大的不义行为,应该挺身而出坚决抵制。为此他不仅“摩顶放踵”,长途跋涉“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”,完成“止楚攻宋”伟大壮举。他既深入浅出讲“非攻”的道理,又付诸行动伸张正义,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。墨子视人如己的思想,表现出炽热的天下情怀。正如庄子评价其“真天下之好也,将求之不得

也。”不论生逢何世,不论身在何处,都需要正义的追求、火热的真诚和无私的付出。

中国哲学发展到两宋时期,逐渐达到高峰,其中被称为“北宋五子”之一的张载就是一个奠基性人物。他一生跌宕起伏,两被召晋、三历外仕、著书立说,开宗立派却终身清贫。他经历了人生的数度磨难,终创“关学”成为一代宗师。明清之际大思想家王夫之高度评价张载“上承孔孟之志,下救来兹之失”。他提炼的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千百年来振聋发聩,被称为“横渠四句”,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的理想,很多读书人都会有“与我心有戚戚焉”的共鸣。最令我受触动的是张载所作只有253字的千古名篇《西铭》里的“民胞物与”这个概念,意思是民是我同胞,物皆我同类,我对他人他物均应像兄弟一样对待。这些灵魂触动,对我多年的教育生涯源源不断地给予浸润,经年累月终将积淀成文化心理品格。

南宋初期与朱熹齐名的“百世大儒”陆九渊,号象山先生,上承孟子而开创心学一脉。他兼理学家代表人物朱熹“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”的为学主张过于复杂烦琐,提出“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”这个简单而干脆的办法,主张“心即理”,理就在心中,不必多向外求,“心”为一切道德价值的根源,应该由“明心”而扩展到

读书问学。这种“简易直截”的观念直接启发了几百年之后的王阳明。

历史上著名的“鹅湖之会”典故,讲的就是陆九渊和朱熹在铅山鹅湖书院展开的有关“心”与“理”的大辩论,两派观点互相交锋,成就一段学术佳话。据记载,陆九渊曾受朱熹邀请到白鹿洞书院为学子讲授《论语》中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一章。陆九渊的演讲感动了论辩对手。陆九渊讲做一件事最根本的是什么?到底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,是坚守义还是追逐利,这一念之微最为关键。朱熹请陆九渊把所讲要义写成文字,刻石立于白鹿洞书院,并邀陆九渊泛舟同游,惺惺相惜。这个故事一直打动着,并始终看作中国思想史中最伟大的场景之一,两个在致思学问上争得面红耳赤的巨匠,却在品德境界方面互相钦佩欣赏。

20多年时间里,每每在对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,除了重点讲解每位哲学家的思想主张之外,都不吝言语和笔墨尽可能铺陈其思想体系形成的思路历程,以此达到启发智慧和涵养德性的双重作用。毕竟中国古人的学问归根结底是在追求“致广大而尽精微,极高明而道中庸”的人生境界。(制图 董昌秋)



辽宁省第十四届全民读书节特别报道

## 那些闲适又不乏锐利的小评论

周立民

读理查德·艾尔曼的《乔伊斯传》,里面写到《尤利西斯》最初是发表在一份名为《小评论》的杂志上,这份杂志由玛格丽特·安德森和简·希普两位女士主编,“这家刊物更倾向于创新,以发表散文为主”。(【英】理查德·艾尔曼:《乔伊斯传》第480页,金陵等译,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2月版。)她们欣赏乔伊斯的创作,面对社会各种压力都不屈服,后来为这部杰作还上过法庭。我们不必事后诸葛亮的态度去赞赏她们的眼光,至少可以说她们对这部作品和作家的捍卫是尽心尽力的,也可以说是爱和欣赏吧。

当年看到过《小评论》的刊名时,我就曾想:真不错,将来拿它做一个书名。我设想中的“小评论”,可长可短,以精短为主,用随笔或札记的形式写出,既是作品品评,也是我的心境自述。文字要闲,却又不乏锐利……

据说,“鹿德先生曾数次就美国大学里的学术研究坦率地发表意见,批评它死气沉沉,指出它与真正的文艺鉴赏和富有创意的文学生涯是多么隔绝。她始终准备着与学界作风相对抗。”(【英】托·斯·艾略特:《埃兹拉·庞德的韵律与诗作》,苏薇星译,《艾略特文集:批评批评家》第208页,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6月版。)这是一百年前的事情了,况且鹿德后来还被医生鉴定为精神失常送进了精神病院,自然是不经之论。不过,今天仍然很流行的艾略特在谈庞德的诗歌时,说

过这样的话:“有个肤浅的测试认为原创性诗人直接走向生活,次生性诗人直接走向‘文学’。探究此事,我们发现真正‘次生性’的是将文学误作生活的诗人,而他经常犯此错误的原因无它——阅读不够。”(【英】T·S·艾略特:《引言》,《涉过忘川:庞德诗选》第41页,西蒙·水琴译,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3月版。)我想置换一下,把这里的“诗人”置换为批评家,次生性批评家让批评走向“学术”。批评和学术并非天然对立,互不相容。比如,写学术论文要求克己,最大限度地让“我”躲在“客观”的皮夹克之下,而批评之所以有活力,恰恰是这种文字里,“我”的鲜活可见。在某些时候,我并不认为批评是对作品判断、检讨、“指点”,它更是对话、交流,甚至是评论家以作品为素材的自我表达,这才是它更有魅力之处。

“小评论”应当是我下一本评论集的名字,这里被我偷偷提前使用了。偷懒的背后还有一种惫懒的心绪。这些年,我所写的当代文学评论的文字越来越少,我从不否认当代不乏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,我也不愿远离他们,只是不在那些热闹喧嚣的文学“现场”,而在安安静静书斋里,在作家的书本之间。我更愿意隔着书本与作家交流,更愿意躲进小楼成一统,谈一点对那些不曾轰轰烈烈的作家的感想,与“流量”远一点的“小评论”,却真实地出自我心。



鲁迅编完自己的集子后,曾说:“但愿这本书能够暂时躺在书摊上的书堆里,正如厚厚的大地,不至于容下一点小小的土块……”我也奢望为“小评论”留一点空间,寄存我并无意争一日之长的闲心。我不揣浅陋把这些新新旧旧的文字编在一起,梳理它们的心态与鲁迅编《坟》时的感觉可能很接近:“就是这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。所以虽然知道过去已经过去,神魂是无法追踪的,但总不能那么决绝,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,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,一面是埋藏,一面也是留恋。”(鲁迅:《坟·题记》,《坟》第2页。)

我也想做一件纪念,纪念我走过的时光,纪念曾在一起的人和事,纪念一种自由和任意的心态。特别是我看到其中有一篇为谢有顺的随笔集所写的书评,那是20多年前,回想意气风发的谢有顺和那些时光,我有那么多感慨;今天重读收在书里的一些文字,我为自己当年的坦率,无所顾忌而惊讶。倘若它们伤害过谁的话,我请求原谅,请接受我的真诚和理解曾经的热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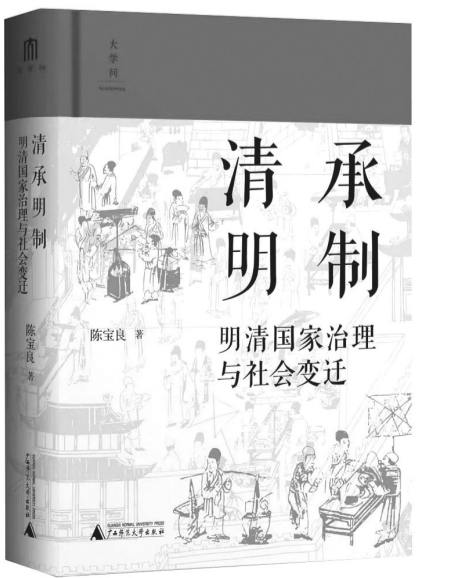
前年,鲁迅作品单行本重印时,我请出版社的朋友寄了一套给我,有别于厚重的全集本,这两年,我断断续续地闲读起来。人过中年,再读鲁迅,读出他的忧伤和沉重自然不稀奇,在这之外,我感到的不是冷,而是热,是温暖和坚毅,比如这一段:“如果我的过往,也可以算作生活,那么,也就可以说,我也曾工作过了。但我并非喷泉一般的思想,伟大华美的文章……不过我曾经尝得,失望无论大小,是一种苦味,所以几年以来,有人希望我动笔的,只要意见不很相反,我的力量能够支撑,就总要勉力写几页东西,给来者一些极微末的欢喜。人生多苦辛,而人们有时却容易得到安慰,又何必惜一点笔墨,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?”(鲁迅:《坟·写在坟后面》,《坟》第298页。)先生说得多好啊,这也是我的心里话。它也鼓励我,有一天我还是要把那本真正的“小评论”写出来,这正所谓“哀莫大于心不死”吧。

# 烟火人间:明清社会治理的世俗化动力

尤 鉴

提示

陈宝良教授的《清承明制:明清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》是一部打破传统政治史框架、以社会史与文化史视角重构明清历史叙事的创新之作。其学术深度与叙事魅力相得益彰,勾勒出一幅跨越朝代更迭的“大历史”画卷,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重新理解明清社会的窗口,揭示出明清两代在社会治理、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层连续性。



《清承明制:明清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》(以下简称《清承明制》)以“清承明制”这一经典命题为切入点,却并未止步于制度层面的承袭与变革,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世俗社会,通过鲜活的社会群体、流动的世风世情、繁复的地方治理实践,勾勒出一幅跨越朝代更迭的“大历史”画卷。这部著作既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论著,又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的通俗读本。

传统史学对“清承明制”的讨论多聚焦于政治制度与皇权强化,例如清代内阁对明代内阁的继承、军机处对皇权的极端集中等。陈宝良则另辟蹊径,将“制”的范畴从典章制度扩展到社会运行机制,揭示了明清两代在社会治理、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层连续性。

《清承明制》中对“镖局”起源的考证颇具代表性。明代的“镖客”因商人旅途安全需求而兴起,至清代演变为职业化的“镖局”,其名称从“保镖”到“保镖”的流变,既反映了商品经济下社会分工的细化,也暗示了明清两代治安问题的延续性。这种从“制度溯源”到“社会功能”的视角转换,让读者看到“清承明制”不仅是政治体制的继承,更是社会需求的自然延续。

作者对“幕府人事制度”的梳理同样精彩。明代幕僚多由科举失意的文人担任,清代则进一步形成专业化、层级化的幕僚体系。这种“佐治检吏”的群体,既是皇权下地方治理的工具,也是科举制度“溢出效应”的产物——大量无法通过正途晋身的读书人,以幕僚身份参与社会治理,成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“中间阶层”。这种分析从社会流动与知识群体生存状

态的角度,揭示了制度变迁背后的世俗化动力。

陈宝良笔下的明清社会,是一个充满矛盾张力的世俗化世界。商品经济的发展、市民阶层的壮大、思想解放的暗流,共同推动着社会从“礼法秩序”向“世俗生存”转型。书中通过部分群体的命运浮沉,生动展现了这一过程。

“富不教”的塾师、“清客帮闲”的文人、“侠客化”的僧人,这些群体在传统史学中往往被忽视,却是明清社会世俗化的缩影。明代科举制度的僵化催生了庞大的落第文人群体,他们或投身幕府,或成为讼师,甚至混迹市井,以知识技能谋生而非“治国平天下”。这种职业分化不仅反映了科举制度的失效,更揭示了知识阶层从“士大夫”向“职业人”的身份转变。

天地会、镖局、会馆等组织的兴盛,标志着民间社会力量的崛起。作者表示,这些组织虽被官方视为“隐患”,实则是社会自我调节的产物。例如,清代会馆从同乡互助组织演变为行业垄断机构,既填补了官方治理的空白,也加速了商业资本的聚集。

陈宝良的独特之处在于将《儒林外史》《水浒传》等文学作品视为“社会史档案”,以文史互证,捕捉文学叙事中的世情百态。书中对“阴曹地府的诉讼”“僧人的侠客化”等主题的解析,既充满文学趣味,又具有史学深度。例如,《西游记》中孙悟空大闹地府的桥段,被作者解读为明代民间对司法不公的隐喻。阴司诉讼的荒诞情节,实则是现实社会中“好讼”风气的投射——明代江南地区诉讼成风,甚至出现职业讼师群

体,这种“以阴讽阳”的文学手法,成为观察世俗社会的重要镜像。

《清承明制》中引用《十叶野闻》中镖客与盗贼斗法的故事,揭示镖局行业的江湖规则:镖客不仅需武艺高强,更要深谙人情世故,通过“递帖子”“拜码头”等方式与黑白两道周旋。这种“以小说补正史”的方法,让历史叙事更具血肉,也凸显了世俗文化对制度运行的渗透。

陈宝良的写作始终贯穿着对现实的观照,反映了历史书写的当代性。书中对“谣言传播”的分析尤为深刻:从明代“倭寇来袭”的恐慌,到清代“选秀女”引发的民间婚嫁狂潮,作者认为,信息不对称与权力结构的失衡,是谣言滋生的温床。

作者对“清承明制”的辩证解读,也为理解历史连续性提供了新思路。清朝虽以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,却在社会治理层面大量沿用明制,甚至将明代后期的世俗化趋势推向高潮。这种“继承中的创新”提示我们:历史变革往往不是断裂式的颠覆,而是层累式的调适。

这是一部“接地气”的学术典范之作。《清承明制》实现了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完美平衡。陈宝良以“小人物”的命运为经,以制度与社会的互动为纬,编织出一张覆盖明清两代的世俗化网络。塾师的清贫、镖客的江湖等细节共同构成了一个真实可感的“人世间”。

《清承明制》提供了一种“向下看”的历史观——真正的历史动力,往往藏匿于市井巷陌、众生百态之中。正如作者所言:“继往”方能“开来”,唯有理解世俗社会的韧性,才能读懂中国历史的深层逻辑。



## 漫长的旅程

李海卉

文学爱好者往往是旅行者,他们拥有相似的好奇心与想象力。旅行文学家保罗·索鲁说:“我是所有我读过的作家,去过的地方,在所有时代遇见和爱过的人。”作家们不断触及广阔幽微的风景与参差多态的人生,旅行者则带回远方的故事,收获丰饶的生命。

中国古人对旅行的理解,交织着诗意与哲思。李白言“夫天地者,万物之逆旅也”,白居易道“我生本无乡,心安是归处”,旅行不再是地理的位移,而是心境的栖居,而他们漫长的旅程凝练成了一部流动的文化史。

旅途往往是磨难,常与艰险相伴。李白慨叹“蜀道之难,难于上青天”,道尽翻越秦岭栈道的生死一线;戴叔伦除夕夜困于驿站,写下“一年将尽夜,万里未归人”,说出游子归途的绝望。正是这些困境催生了旅人的坚韧,流括行囊中必备斧、锄、夜壶,以应对荒野求生,而张骞凿空西域、玄奘孤身西行,更将困顿升华为文明的壮举。旅行家徐霞客的《游记》以60万字描摹山川名胜,堪称地理与文学的双重丰碑;诗人张继夜泊枫桥,一句“夜半钟声到客船”,让寒山寺的钟声穿越千年。

庄子的《逍遥游》为旅行注入了哲学意蕴。他笔下的大鹏“水击三千里”,突破空间的桎梏,喻示精神的自由。苏轼在《赤壁赋》中叹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”,则将个体置于宇宙之中,旅行成为对生命本质的叩问。

保罗·索鲁的《旅行之道》是一张由文字编织的地图。索鲁将自己比作读过的书和去过地方的集合体,他将但丁的炼狱、康拉德的刚果河、纳博科夫的美国公路纳入旅途的“车厢”。他在书中提到一个悖论:最真实的旅行体验往往诞生于最不自由的时刻——火车误点时的闲聊,边境检查站的僵持,或是迷路后偶遇的葬礼。这种“被迫的停顿”消解了观光客的功利性,让旅行回归本质:不是征服空间,而是让空间征服你。索鲁在书中首页记下:“在你成为道路之前,你不能走上那条路。”他暗示一种谦卑——真正的旅行者必须成为道路本身,承受所有风沙的磨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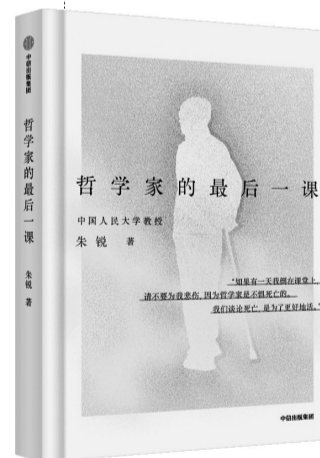
麦克法伦的“行走三部曲”走向更原始的维度。《念远山》中,他攀上阿尔卑斯的冰斗,发现登山者的尸体如佛陀般静坐雪中;《荒野之境》里,他躺在威尔士海岸的悬崖上,听见“风将岩石的记忆吹成沙粒”;《古道》则追问:当我们的脚步重复踏同一条小径,究竟是人在塑造道路,还是道路在驯化人?他的行走带着地质学家的耐心,将山峦的褶皱解读为“地球的日记”,又从荒野的寂静中提炼出对抗都市异化的解药。这种书写打破了游记与哲学的界限——行走不再是位移,而是一场与时间、物质、记忆的对峙。

旅行的本质是对世界的诘问,亦是对自我的勘探。行走不是逃离,而是更深的介入——介入他者的命运,介入历史的暗流,介入自我认知的盲区。所谓旅行之道,不过是学习如何与未知共存,并在共存中看清自己与世界原本的模样。

旅行的意义,或许正如王阳明家书所示:“既去几近,以游高明”,在远游与相遇间,寻得生命的澄明与辽阔。

荐书

## 生命咏叹调



《哲学家的最后一课》 中信出版集团

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朱锐留下的文字,直面每一步接近死亡的进程。他无所畏惧,并将对生命和死亡的思想带至人生最后时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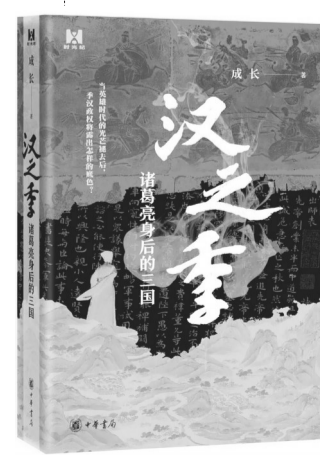
这本书源自朱锐生命最后的十日对谈,以及在人民大学开设的最后一门哲学课,汇集了他30余年的思考。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,我们谈论死亡,是为了更好地活着。



《长篇的咏叹》 人民文学出版社

跟随20位文学大家,走近新世纪文学现场。《长篇的咏叹》是文学批评家王春林的最新评论集。

本书选取作家迟子建《群山之巅》、张炜《独药师》、东西《篡改的命》等近年来的长篇小说作为分析对象,剖析了它们的独到之处,全方位聚焦长篇小说的美学特质,多视角展现评论家深刻的思考。



《汉之季——诸葛亮身后的三国》 中华书局

以蜀汉政权下的微观视角详解三国后期的博弈与斗争。本书聚焦的蜀汉建兴十二年(234年)之后的三国。从这一年开始,三国褪去了英雄的光彩,呈现出历史真正的底色。魏、蜀、吴三国经历开国一代的辉煌蓝缕后,开始面临着各自的困境。在三个政权之间的冲突、联盟、制衡的复杂关系中,呈现出特别的智慧。